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 简 报

2014 年第 1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4 年 1 月 22 日

---

## 编者按

1. “全民医保”可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吗? .....赵绍阳 尹庆双 臧文斌
2. 我国农村医生工作量受何影响? ..... 赵天
3. 如何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谭燕芝 陈彬 田龙鹏 黄向阳
4. 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净影响研究.....郭君平 吴国宝
5. 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蔡荣 蔡书凯
6. 外来人口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 张鹏 郝宇彪 陈卫民
7.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陈思霞 卢洪友
8. 短期冲击的长期影响及其政策应对..... 高明
9. 出口贸易恐难提高女性就业.....陈昊 刘骞文
10.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性质及对 Shibor 的实证研究..... 项卫星 李宏瑾
11. 内资股权、外资股权和中国银行业改革.....喻微锋
12. 市场情绪变化与危机前后的股债关系.....许祥云 廖佳 吴松洋
13. 创投对中小板公司 IPO 折价的影响：监督认证，还是市场力量.....汪炜 于博 宁宜希
14. 明斯基的时刻真的来临了吗? .....李黎力

## 《经济评论》简介

##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面向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将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 1. “全民医保”可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吗？

赵绍阳（四川大学）、尹庆双 臧文斌（西南财经大学）

《医疗保险补偿与患者就诊选择——基于双重差分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  
2014 年第 1 期

如果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你需要决定该去哪家医院就诊。或者就近选择一家较小的医院，价格肯定不会太贵，关键是不需要排队；你也可以选择去一所大些的三甲医院，花费肯定是要贵一些的，而关键是肯定要排队，甚至需要找个熟人拖点关系才能进得去。你之所以如此纠结，主要是因为，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病：“不大”指的是，还不足以使你义无反顾地冲进大医院，“不小”则指的是，万一小医院没治好，还是要去大医院！你该如何抉择？

价格与医疗服务的质量，应该是主宰你决定的关键因素。而各地大医院的“拥堵”现象表明，你更加偏爱大医院的质量而忽略了其昂贵的价格。而如果许多看小伤小病的也一起涌到大医院，就会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这应该是目前“看病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特征。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解决或者缓解这一困境呢？

办法不外乎两个方面：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向大医院看齐（这个肯定比较难做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时间）；提高大医院的收费（这个肯定比较难接受！）或降低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价格，扩大基层与大医院之间的价格差异，激励更多人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我们正在双管齐下。一方面，政府正在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与支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基本药物制度、医保补偿等方式，降低基层就诊的服务价格。职工医保、新农合以及城镇居民医保在报销待遇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越是基层的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越高。这样做会有效果吗？

显然，医保报销的倾斜是否可以有效影响你的选择，其关键在于，在你看来，与医疗服务质量的差别相比较，价格的差异有多重要？简而言之，如果你更看重医疗服务质量的差异，那么即使对基层医疗采取较高的补贴，由于不足以弥补质量方面的差距，你依然会选择在大医院就医；反之，当基层与大医院之间的服务质量差别较小时，则可能通过医保给予基层医疗服务较高的补贴以促进你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所以通过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对基层医疗实施补贴是否具体明显的效果，取决于价格因素在你做出选择时的相对重要程度（主要相对于服务质量）。

我们采用成都地区患者就诊选择的数据，来检验通过医保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补偿是否可以影响现实中你的选择？我们的结果显示，医保的补偿确实对一部分患者的选择产生了影响，但是只是一小部分最“纠结”的患者（他们原来在大医院和小医院之间摇摆不定）。所以，目前医保补偿对医疗机构选择只有微弱的影响，医保补偿的价格调节作用仅仅对少数患者产生了效果，还不足以改变当前多数人对大医院的偏好。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看来还是任重道远！

## 2.我国农村医生工作量受何影响？

赵天（北京大学）

《中国农村基层医生工作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三省医疗机构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关注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就不能忽视掉医生这个群体的工作状态。医生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其工作状况与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年所能提供的服务量都在大幅度提高，但是我国医生的数量的增加却没有同比例的提高，这就给医生工作带来了越来越重的负担和工作压力，医生普遍表示高强度工作、频繁的加班是工作的常态。同时，我国医疗资源对城市的倾斜也使农村基层医生面临更为严峻的工作负担压力，影响到农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对正处在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那么，我国农村医生正处在哪种工作状态，他们的工作量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我们对医生个体的访谈，对甘肃、河南、广东三省的县级医生和乡镇级医生所在的机构情况、医生的个体特征信息、医生的工作量状况、以及医生对其工作状态的自我评价等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分析。根据数据情况将医生的工作量分成了两类，一类为客观工作量，也就是将医生平均一天所承担的门诊病人数量、平均一天负责的病床数量以及平均一天在医疗活动上所使用的时间作为医生的客观工作量；另一类为主观工作量，即自身对个人工作量的感受和评估。

对客观工作量的研究分析发现，工作时间在不同特征下的医生间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医生总体每周平均工作超过6天，每天在医疗活动上花费8.5小时左右，80%以上的医生在过去的一周有过加班经历。工作经验丰富的医生比较明显地具有较高的工作量，县级医疗机构的医生工作量要大于乡镇级医生，广东省医生比其他两省医生更加繁忙，护士医生比例从整体上对医生工作量有着正向影响，医生收入对工作量没有显著影响。

对主观工作量的研究分析发现，工作时间过长是医生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询问医生在单个病人门诊中所使用的时间是否合理时，表现出了很明显的科室间的差异；通过比较医生在门诊和住院的的实际的服务量和他们所认为的合理的服务量，发现医生认为在更为合理的情况下每天可以承担更多的门诊病人、更少的病床数。

对农村医生工作量的分析其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了发掘其所在的医疗系统所存在的问题，例如医生供给的短缺、医生负荷过高所导致的人力资源的潜在流失、绩效工资体制的不完备等。同时，也从中获得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医生的激励政策，将吸引高层次医学毕业生和激励经验丰富的医生留在医疗系统相结合；建立起完备的以工作量和工作效率作为考核基础的激励机制，提高医生工作的积极性；在农村医疗系统内部，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保障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对居民在乡镇医院住院需求的支持等。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和完善关系到医疗系统的服务能力，关系到每个医生的事业发展和工作状态，也关系到整个国家人民

的福利水平。

### 3.如何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谭燕芝 陈彬 田龙鹏(湘潭大学)、黄向阳(湖南银监局)

《什么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农村金融排斥难题?——基于 2010 年中部六省 667 县(区)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自 1997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国有银行要加快商业化改革步伐后,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的国有银行加速离乡,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波动中逐步扩大,从 1984 年的 1.8 上升到 2002 年的 3.2。2003 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新成为重点,特别是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农村经济稳定程度总体好于城市,农村和县域在“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得益于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遏制。相应地,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问题也由冷转热,由摸着石头过河转为理性推进,重新成为政府施策、学界关注的热点。

现今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尚低,大中型金融机构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的考量,更倾向于服务人口规模和密度大、人均收入高、更有利于发挥金融服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作用的城市地区;而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扎根县域,更多地发挥了服务三农主力军作用。在当前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全面推广的情况下,乡村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农村金融机构能否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对盈利产生显著影响。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布局设点更多是行政干扰的结果,很可能出现人口规模、人均收入与金融机构网点数不匹配的情形,导致原本总体数量不多的农村金融机构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地区能够获得的金融服务更加短缺。

我国 2000 多个建制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可以说“一县一特色”,农村金融改革并不存在“一刀切”的解释模式,因此,分析农村金融问题时需要树立地区差异的思维。按轻重缓急的原则,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大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并积极稳妥推动新型城镇化,这是解决农村金融难题的根本出路。二是地方政府应通过市场化手段,积极合理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努力形成良好的银政合作关系,这破解农村金融难题的基本保障。三是在存量金融机构改革的同时,重点通过降低各种门槛等方式,加大增量机构改革力度,这是消除农村金融难题的关键。四是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侧重提高农民非农收入,这是规避农村金融难题的基本动力。

综上所述,破解农村金融难题需要多策并举。但需要强调的是,打政策组合拳虽意味着有所侧重,但切忌一刀切。对金融机构分布情况不同的县域,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力度往往千差万别,这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因地制宜地采取服务策略。

### 4.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净影响研究

郭君平 吴国宝(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影响评价——以亚行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例》，《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消费是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重要生理与经济行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农户兼具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二重属性，因此，研究农户家庭消费的水平、结构及行为特征，不仅可知悉不同类型农户的生活质量或富裕程度，也能管中窥豹从一个侧面略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情，更甚者还有助于政府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识别“真穷人”，以确保各项优惠政策和扶贫资源能够公平合理地倾向最需扶持的贫困地区或群体。农户生活消费水平是指农户家庭消费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质与量”上满足其全部成员自身生存、发展及享受需要等方面的程度，其变化可用恩格尔系数的升降、人均消费额与实物消费量的增减来表现；农户消费结构则可理解为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不同类型资料的数量结构和货币支出结构的总和，其变动情况可考察各项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众所周知，影响消费的因素众多，除去利率、物价和收入分配等，还有收入这一最重要因素。因而，西方的消费收入理论大多将消费与收入联系起来并建立相应函数以阐述此二者间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理论有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反观国内既有文献，很多学者也对中国农民的消费问题做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关于社区扶贫示范项目对当地农户收入或消费影响的研究文献却极为有限，迄今仅有王永平等（2006）以此扶贫项目为个案简要评价了参与式扶贫的运行机制和绩效。

与以往研究不同，笔者利用贵州纳雍贫困村三年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以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研究对象，跳过“扶贫项目→农户收入变化→消费变化”链中的收入变化环节，运用偏差矫正匹配估计量和倍差匹配估计量，直接评价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水平及结构变化的净影响。其中，社区扶贫示范项目，全称“亚行贵州纳雍社区综合扶贫开发示范项目”，属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指以农村社区为瞄准单位的综合而非单一的开发式扶贫模式）范畴，是我国政府于1998年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技援项目中“基础设施发展”分项目的一个研究性试点项目，旨在通过建设电力、饮水、灌溉、公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并辅以其他技术支持，来检验社区综合扶贫项目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减贫的影响程度。

经研究分析发现，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能显著提高、改善当地农户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并且在项目结束后较长时间内仍具有一定的持续效应。具体表现为：在主体项目实施期，该项目对恩格尔系数有明显的负影响（净降15.23%），但对生活总消费支出及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等分项消费支出（家用设备及服务支出除外）均有显著正效应；而在“项目全程+后续监测观察期”，除食品支出不显著外，该项目对其他各类消费支出（正）和恩格尔系数（负）都有显著效应。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论，就我国扶贫政策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推行以村庄或社区为扶

贫基本单位,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其次,切实落实赋权于民,即给予农民更多知情、参与、表达及监督的机会和权利,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减贫行动主体;第三,继续扩大对农村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劳务输出培训,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强贫困人口消费能力;最后,调整扶贫战略思维,尽快从“生存型贫困指向”转换至“发展型贫困指向”,注重提升贫困人口的自主发展能力,而非简单提供基本生存的生活保障。

## 5.村庄规模、收入不均等性与村庄集体行动

蔡荣(南京财经大学)、蔡书凯(安徽工程大学),《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农田灌溉设施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设施之一,其运行效率的好坏直接关系农作物的收成和水资源的使用效率,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据统计,全世界有1/3的粮食生产应归功于农田灌溉设施,我国约有近八成的粮食产量来自灌溉地块。可以说,农田灌溉设施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是,自2001年起实施的税费改革逐步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这一农村公共物品管理资金的主要来源,不少村庄农田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和功能退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惠民政策,特别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兴农田灌溉设施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田灌溉设施建设和维护,缓解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用水的供求矛盾,农民的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然而,“农民管不了、集体管不好、国家管不到”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并且由于农田灌溉设施发展规划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建设标准低、老化失修与功能退化现象严重、管理改革不到位等原因,致使农田灌溉设施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促进农户参与农田灌溉设施建设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村庄层面来看,村民对农田灌溉设施维护这一集体行动成本和收益的差异化感知是影响村庄集体行动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则是影响村民对村庄集体行动成本和收益感知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安徽省水稻主产区村庄调查,研究发现村庄规模过小或过大、收入不均等性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村庄集体行动,只有在村庄规模和收入不均等性处于中等水平的村庄,集体行动才容易形成。另外,户均耕地规模对村庄集体行动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外出打工户比例对村庄集体行动则存在抑制效应。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第一,应合理设置村庄规模,既不宜过小也不宜过大。规模过小的村庄可以通过合并方式扩大村民户数,克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时间和精力约束;规模过大的村庄可以通过村民小组的形式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缓解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等难题。第二,应认同村庄内存在适度的收入差距,既不应过分强调收入均等化也不能纵容收入两极分化。在实践中,应对农村能人或“精英”提供扶持政策,鼓励其发展,但同时也要积极发挥其带动作用,真正实现“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大多数人富裕”的目标。第三,加

快城市化进程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耕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对于很多农户而言,正是因为拥有的耕地规模较小,不得不外出打工挣钱以弥补家庭消费性支出,降低了对种粮收入的依赖性,最终造成集体行动激励下降。

## 6. 外来人口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

张鹏(中国社会科学院)、郝宇彪(北京师范大学)、陈卫民(南开大学)

《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基于 2011 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从人口迁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看,迁移涉及到人口在两个地区间的地理或者空间流动并伴随着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变化,这种以定居迁入地为目标的人口流动通常是由于迁入地的经济、政策、环境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优于原居住地,从而使得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经济效用高于迁出地。外来人口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迁徙群体,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来人口背井离乡“以脚投票”选择到机会更大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为城市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然而,外来人口的离土不离乡、职业的转变并没有使得身份发生真正转变,其“市民梦”依然需要迈过较多门槛才能顺利实现。

目前,各地区从外来人口户籍、收入、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进行改革,推进外来人口和本地市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外来人口稳定下来和“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上述措施会促进外来人口收入、就业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改善,提高其迁移城市的动力。不过,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收入、就业和社会服务的改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提高外来人口的物质生活方面,还可能通过提高外来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融合程度来促使其迁移城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主观幸福感和社会融合程度反映了该群体的社会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直接关系到他们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关注外来人口的幸福和社会融合程度才能发现原有政策的不足和未来改进的方向,真正发挥外来人口在城市的“主人翁”地位,积极参与城市发展和建设,才能实现城市的健康发展和为快速推进城市化提供可靠的保障。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2012 年发布的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数据资料,农民工幸福感排在前列的是泉州、青岛、长沙等二线城市,排名靠后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显然收入较高、机会较多的一线城市并不能一定带来外来人口幸福感的提升,也更凸显了以外来人口幸福感及社会融合程度提高为政策着力点的意义。基于上述认识,使用国家计生委 2011 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显示,幸福感和社会融合对于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实中,外来人口不同的教育背景、技能差异使得外来人口所从事的行业不同,导致他们之间职业地位和收入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否认的是,行业较高端职业地位较高,意味着工资收入高、福利待遇好、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也高,因而更可能社会融合程度高、幸福感强,反之则相反。对这一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好行业、高端



职业和高收入的外来人口幸福感提升和社会融合程度的增加对落户意愿的影响要大于差行业、低端职业和低收入的外来人口，支持了上述论断。

因此，未来的政策导向不仅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困难和后顾之忧，改善他们的就业状况，促进外来人口在流入地的物质福利条件和本地居民逐渐一致，还需要城乡统筹，切实解决外来人口在流出地存在的问题。通过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等形式提高外来人口人力资本水平，逐步消除外来人口职业向上流动的门槛，增加外来人口职业向上流动和收入不断增加的机会，降低行业、职业和收入差异对外来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只有上述措施的深入推行才能真正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增强他们户籍迁入城市的愿望。从提升幸福感入手探讨促进外来人口落户城市、在城市稳定下来的条件和路径，可成为探索未来我国城市化问题的一条新思路。

## 7.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陈思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洪友（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当下，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政府对环境污染的公共治理也愈加重视。然而从现实状况来看，既有的环境管制手段并没有实现令人满意的治污效果：企业经常通过制度漏洞避开政府的环境管制措施；各级地方政府为拉动本地 GDP 增长也不乐意执行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由此，我们希望找到另一种环境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应该具备如下特征：第一，它不会产生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但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迫使其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及效率；第二，它能够帮助企业更多采用诸如人力资源等清洁性资源进行生产、从而自发降低污染性资源的能耗量、减小污染。

近年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教育、医疗、科技等民生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公共财政改革的“重头戏”。我们感兴趣的是，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如果是，它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对环境质量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效应。从积极效应看：于企业而言，政府提高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支出，为企业清洁性技术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基础；而民生性公共支出有利于社会整体人力素质的提升，降低了企业对能耗污染性资源的依赖，为企业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引进先进的生产管理方式提供了便利。于政府而言，提高民生类公共支出占比，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变了他们对“清洁”产品的偏好并增进了其环境保护意识；这些都可能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水平并合理保证环境规制效率。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当民生性公共支出占比提高时，基于经济规模扩大、政府投资力度缩小以及劳动力要素价格提高等原因，也可能导致企业进一步依赖污染性能耗资源、加剧环境污染。

改变公共支出结构能否有效改善环境质量，主要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积极效

应占主导地位还是消极效应占主导地位。当环境规制水平普遍较低时,公共支出结构减污的边际效应较大,提高民生性公共支出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然而,当环境规制水平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时,政府环境规制的改善以及企业技术进步的空间都十分有限,公共支出结构的改变反而可能加剧环境污染。

现阶段,中国能否依靠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来改善环境质量呢?我们通过细致的验证发现,这一办法在中国是可行的。当教育、科技、医疗等民生性公共支出增加时,企业、政府和社会共同提高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投入力度,企业更多地采纳清洁性技术,政府自发提高环境管理水平,这些最终都降低了污染水平并改善了环境质量。

上述发现蕴含着丰富的政策内涵。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坚持民生为导向,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取得环境污染治理的“双赢”。另一方面,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适当纳入诸如环境质量相关指标,这有利于降低各地方政府之间低效的 GDP 竞赛,并成为公共支出结构优化改革的突破口。

## 8.短期冲击的长期影响及其政策应对

高明(中国人民大学)

《滞后效应与需求管理模式的重新设计》,《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需求管理政策——即控制宏观总需求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如何影响总供给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源远流长且富有争议的论题。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的主流观点是:在短期内,总需求变化可以拉动实际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进而使实际总产出偏离其潜在水平;但在长期内,自然失业率和潜在产出能力都是由经济体的实际结构因素决定的,不会受到总需求变化的影响。但20世纪70年代晚期石油危机爆发后,传统理论却无法充分地解释欧洲失业率持久性上升的现象,经济学家们于是开始探索短期总需求冲击对自然失业率进而潜在生产能力能够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被称为经济学中的滞后效应,也可描述为“在引发变化的初始成因消除后,被触发的变化仍在持续的现象”(克洛斯,1993)。当存在滞后效应时,短期总需求冲击会改变自然失业率和潜在生产能力,这为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滞后效应是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思想,在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得到了美联储的进一步重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出应对冲击时不仅要考虑短期的复苏,更应考虑到长期的挑战,如在美国2001年衰退中,尽管年底时衰退已在技术上停止,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一直保持到2004年初,以促进就业和防止通货紧缩;同样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后,尽管美国经济已在2009年出现回升,但美联储为实现更长期内的低失业率和适度通货膨胀率,又在接近零利率的环境中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在我国,滞后效应思想尚未被系统地纳入需求管理政策的考虑范围,其对应危机和延伸繁荣的指导意义还需要逐步认识和接纳。

可以从滞后效应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 1992 年以来的三个经济周期阶段。在 1991 年第四季度至 1997 年第二季度, 及 2008 年第三季度至 2012 年第三季度两个阶段中, 经济在一开始的低利率区间内保持着较高的平均增长率, 随着利率不断调高以应对通货膨胀, 经济平均增长率出现下滑, 但当利率恢复低水平后, 经济增长率却并未反弹, 反倒进一步下降。在 1997 年第三季度至 2008 年第二季度, 一开始平均增长率在高利率水平下处于低谷, 随后在宽松政策环境中不断上升, 此后利率逐渐转高, 但平均增长率却一反传统理论继续攀升。这些与常规理论不符的现象都不应仅仅解释为统计上的时间滞后, 而应该在深层次上分析是否存在新的可能: 经济实体在外来冲击中受损或受益后, 难以在短期内复原。

要回答上述问题, 需要给传统的经济分析过程添加一个新的条件——潜在产出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缺口变动。结合相关数据资料 and 我国现实, 将新条件下的政策效果结果与忽略滞后效应条件而只注重调节短期波动的传统政策模式相比较, 可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 无论经济周期是由何种性质的冲击所触发的, 经济波动过程总会引起经济体人力资源存量、固定资产存量、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等方面的改变, 这些实际因素是经济体在总量层面表现出滞后效应现象的真正根源。

第二, 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忽略实体层面的改变。忽略滞后效应的后果是, 在负向冲击中会低估衰退的持久性, 从而会造成危机应对不足, 可能出现初步回升后二次探底的可能, 增加使经济陷入持续高失业率和深度萧条的风险。在正向冲击中不能充分利用滞后效应进行因势利导, 错失发展良机。因此, 无论是面对石油冲击和国际金融危机, 还是面对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 需求管理政策都应该综合考虑滞后效应的“牵引”作用, 充分应对衰退或延伸繁荣。

第三, 需求管理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需要有效评估外生冲击的性质、方向、强度, 预测其作用范围和持续时间, 并在此基础上对潜在增长率的目标进行动态的调整, 才能保证政策效果充分考虑了冲击的持久性影响。

## 9. 出口贸易恐难提高女性就业

陈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骞文 (复旦大学)

《中国出口贸易的女性就业效应: 基于筛选-匹配模型的再检验》, 《经济评论》  
2014 年第 1 期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普遍为正, 即出口贸易的增加能够促进社会就业水平的普遍提高。向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都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 却忽视了出口贸易对就业可能产生的性别偏向效应。新-新贸易理论中的筛选-匹配模型认为, 出口贸易可能通过提高企业的筛选门槛而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同影响, 因而我们自然而然怀疑是否也会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不同影响?

事实上, 出口贸易提高企业的筛选门槛, 直接造成了高技术劳动力更愿意 (且能够) 进

入出口企业。如果我们认为性别差异实际上依然是技能差距的话,出口造成男性劳动力更愿意(且能够)进入出口企业显然是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基于筛选-匹配模型甚至不能得出出口贸易提高整体就业的结论,但是毋庸置疑它降低了女性就业。

利用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观察感兴趣的话题。很显然出口交货规模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即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显著为正,甚至其滞后一期的规模增加都依然能够显著提高就业水平。类似的情形同样体现在固定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就业效应上,可见作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力量,固定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水平对企业决定招聘多少员工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管理费用(我们认为是筛选成本的良好替代)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就业水平。但是,出口贸易却降低了女性就业水平,而管理费用对女性就业的消极影响尤为显著,它或许提醒了我们,企业能够找到许多“非歧视性理由”来拒绝招聘女性劳动者。

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针对出口规模与出口企业中的女性就业进行了研究,并不意味着“出口增加,社会女性就业下降”。对于出口贸易与女性就业的机制,Fofana 等(2005)的研究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他们认为贸易扩张导致了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女性工人与男性工人之间的成本比较优势也属于其中一种。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有两种可能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一是随着中国劳工制度的完善以及女性工人生活的福利要求上升,雇佣女工人的成本相对有所上升;二是中国近几年的出口中机械类产品比重较高,在这些行业中,女性工人的密度本身相对纺织业等要低,其可替代程度也较高,而且在这类行业中,男性工人在技术以及承受工作强度方面均有一定优势。同时,随着出口行业的竞争压力加大,对女性工人技能以及效率的“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也可能来源于本身的固有观念——也会导致部分企业更多地选择男性工人。

当然,对出口贸易与女性就业关系的讨论,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采用反事实的处理方法,考察“如果出口企业不出口,女性就业水平该有怎样的变化”。此外,究竟是性别歧视还是技能差距,这将会成为一个迷人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出口可能造成的女性就业水平降低需要引起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即虽然随着出口贸易的扩大,中国必将更多地从中获取利益,但是这种利益能否转化成国内居民的福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合理的政策引导。制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需要充分考虑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诸如劳动者技能、学历、性别、年龄、地域等方面。不加区别地制定统一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往往可能适得其反,至少我们现在发现出口可能并不能够不分性别地提升全社会的就业水平。

## 10.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性质及对 Shibor 的实证研究

项卫星(吉林大学)、李宏瑾(中国人民银行),《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所谓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是指在一国的利率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作为金融市场其他产

品定价参照系的利率体系。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对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健全金融产品定价机制、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配套的重要基础设施,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已正式成功运行六年多。我们对 Shibor 是否发挥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在功能上应具备如下性质:市场代表性、基准性、稳定性、无风险性、期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所谓市场代表性(或流动性、相关性)是指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应是市场参与程度高、能够代表货币市场交易的主体,与主要市场利率保持较强的相关关系。基准性是指基准利率在利率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并起主导作用,能够有效影响其他货币市场利率。稳定性(或可控性、抗干扰性)是指在具备较强市场敏感性的同时对短期性因素的抗干扰性较强,波动不应过于频繁剧烈,这样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能有效影响基准利率,从而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无风险性是指理论上基准利率应该具有无风险利率的特征,因为金融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条件下对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也即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的完整性是指基准利率应是一条期限完整的收益率期限,这样才能成为各期限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是指基准利率能够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实现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市场代表性和基准性是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核心属性。市场代表性是显然的,是市场基准利率重要的必要条件。只有由市场主要参与者共同形成并被认可的利率才有可能成为市场公认基准。基准性则不仅是重要的必要条件,而且还是成为基准利率的充分条件。因为所谓“基准性”,主要就是指具有标准的参考性价格体系,可以用来决定金融合约的现金流、进行金融产品定价并评估投资组合的绩效,并能够影响其他主要货币市场利率。其他四个性质对判断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重要性依次递减,是基准利率核心属性的进一步延伸。

在对我国货币市场和 Shibor 运行情况进行考察之后,分别利用等均值、等方差检验、Granger 因果分析和 EGARCH 模型等方法,对 Shibor 的市场代表性、基准性和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Shibor 较好地发挥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作用,基本确立了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地位,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市场实际交易缺乏因素的影响,三个月以上期限 Shibor 报价与市场真实交易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非市场性的货币市场交易安排、股票发行制度、对货币数量调控的依赖都制约了 Shibor 基准利率作用的有效发挥,在微观金融产品定价、风险管理、财务质量、自律约束以及信息公开共享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今后应以市场机制建设为工作的重点,建立健全报价人制度及报价真实性监管,扩大报价机构范围并优化报价计算方法,加强以 Shibor 为基准的产品应用和衍生品研发力度,引导金融机构转变定价模式,开展 Shibor 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应用,通过市场发展等措施优化理顺报价团和金融市场激励机制,做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货币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之

间的协调配合,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做好信息披露,进一步夯实巩固 Shibor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地位,通过 Shibor 的健全完善,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向纵深领域迈进,促进中国金融和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 11.内资股权、外资股权和中国银行业改革

喻微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中国银行业改革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心的热点话题,改革也一直是在争议中前进的,早在2004年启动银行业股份制改革之前,理论界就围绕中国银行业以“市场结构”调整为主还是以“产权结构”调整为主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市场改革论以产业组织的“结构-行为-绩效(SCP)”为分析范式,认为市场结构才是导致中国银行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引入竞争机制,改变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SCP范式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银行业效率低下是系统性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只有厘清产权,建立现代化的银行公司治理制度,才能真正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和降低银行经营的风险。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银行业于2004年正式启动股份制改革。借着改革的风潮,大量的境外资本(外资股权)和民营资本(内资股权)纷纷进入银行业。但是外资股权和内资股权对中国银行业效率和风险的影响是否一样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对该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政策选择。如果一样,则中国银行业接下来改革的政策选择将简单很多,任意地选择内资外资的比例,改革的效果都会相同。但如果各有影响的侧重点,则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政策选择将会复杂很多。如果不明白各自影响的侧重点,盲目使用政策工具,不仅改革的效果甚微,而且还有可能把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推向深渊。

从理论上讲,要厘清产权,就是要厘清政府与银行的关系;要建立现代化的银行公司治理制度,就要首先对大股东的“掠夺”行为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国家大股东通过“关联贷款”对银行进行“掠夺”是造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迅速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外资股权和内资股权的引入在理论上都能有效地制衡大股东对公司的“掠夺”行为,但由于中国的监管法规定,单个外资机构持股中资银行比例最高不超过20%,外资银行持股中资银行总额不超过25%。因此,实际中,能够真正对大股东“关联贷款”形成制衡的主要是民资股权。同样,虽然在理论上,所有制改革都能提高银行效率,但由于“环境同质性”决定了中资参股企业无法有效地改变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因此,在提高中国银行业绩效方面,民资股权的作用有限,而外资股权的进入能显著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绩效。

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外资股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绩效上,而对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民资股权的进入能显著改善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行为,但是对中国银行业绩效提升影响却有限。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发现,我们认为,要根据不同的改革目标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如果要提高银行业的绩效,就应该以引进外资为主;

如果要改善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则应该以引进民资股权为主。

## 12. 市场情绪变化与危机前后的股债关系

许祥云（南京财经大学）、廖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吴松洋（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金融危机前后的中国股债关系分析——基于市场情绪变化的解释视角》，  
《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作为主要的资产配置市场，对其相关性的研究和分析能够为投资者、筹资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各相关方提供更全面的决策视角。在对金融危机前后的中国股债关系的分析中，市场情绪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债市场存在怎样的关系，哪些因素主导着这个影响机制，市场情绪的变化对其又具有怎样的影响？

股债市场之间存在着时变特征，这一点已被目前的诸多相关研究所证实。对于这种时变特征，以往的研究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率、经济周期、利率及不确定性）和微观经济因素（流动性等）导致的，而忽视了市场情绪的作用，更没有注意到不同环境下市场情绪变化的独特性及其对股债关系影响的差异性。首先，股市状态和股票市场不确定性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情绪的变化，熊牛等市场状态下的市场情绪变动是导致两个市场流动性变化的重要原因。股票市场情绪的高涨或低迷，会导致投资者的跨市场交易行为和资金的跨市场流动，从而产生流动性变化。其次，在相同的股市状态后面，市场情绪变化特征及影响机制可能并不一样。熊市中市场情绪低落，但在危机状态下，风险规避情绪强烈，流动性很弱，股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安全投资转移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导致股债负相关，产生“翘翘板效应”，而在非危机状态中，市场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投资者并不是十分恐慌，“安全投资转移效应”可能并不明显，此时，股市的低迷既可能通过“流动性效应”导致股债的负向关系，也可能将低落情绪传染到债券市场，产生正向关系，并且股市下跌越多导致市场情绪越低落，债券价格下跌也越多。牛市中，市场情绪的高涨，一方面可能使投资者偏好于风险资产，追求资产收益性，从而增加股票资产，减少债券持有，产生“跷跷板效应”，并且股市上涨越多，债券价格下跌越多，另一方面高涨的股票市场情绪也可能会带动整个金融市场乐观情绪，传染到债券市场，带动债券价格上涨，产生正向的股债关系，而且股市上涨越多带动债券上涨也越多。因此，市场情绪变化对股债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具体哪种机制起作用 and 总体影响如何取决于具体的市场环境。

在利用上证综指指数、上证国债指数、上证企业债指数等数据对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国债与企业债）的研究中发现，在股票市场的牛市和熊市情况下，投资者强烈的乐观与悲观情绪都更容易感染到债券市场的波动。具体而言，当股市处于牛市时，受投资者高涨的投资热情的影响，大量债券市场资产向股票市场转移，使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

场的波动存在负相关性,在熊市情况下亦然。而当股市处于震荡期内,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由于市场波动的存在,投资者多处于谨慎状态,不易受到来自市场本身以及其它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其自身对情绪性投资的控制也较为严格,在这种情况下股债市场的波动相关性开始变得不显著。

在对国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以及企业债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分别分析中,我们发现,在股票牛市或熊市情况下,股票市场的投资情绪都能感染到国债市场的波动,而企业债市场仅在熊市情况下做出反应,并且相对于国债来说,企业债的避险功能只在市场情绪十分紧张的阶段才会体现出来。因此,市场情绪的变化是影响股债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同条件下市场情绪的变动呈现出很强的独特性,其对股债关系的影响机制也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投资者在利用股票和债券来分散投资时,需要谨慎分析特定环境下的市场情绪变化及其影响机制。

### 13.创投对中小板公司 IPO 折价的影响: 监督认证, 还是市场力量

汪炜 于博(浙江大学)、宁宜希(美国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分校、浙江大学),  
《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能在中小企业的成长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减弱资本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那么创投减弱信息不对称的机制、路径和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

20 世纪末,“监督筛选假说”和“认证假说”(统称为经典假说)横空出世,基于市场有效性的前提,认为创投参股能够提高企业首发上市时的发行定价,从而表现为创投参股企业的首发折价率更低。早期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这一假说。但近几年来部分国家或市场中的研究均得出了与此相悖的结论,耐人寻味。相应的假说推陈出新,例如“市场力量假说”认为创投能够吸引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二级市场参与者,帮助发掘股票价值,从而改善原来较低的二级市场定价效率,最终影响企业首发折价率。

与此同时,创投也已迅速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热点之一,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内学者以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创投为对象,对经典假说进行检验,都没能得到“创投参股能降低企业首发折价率”这一预期结果,也未能对该市场异象进行深入解释。

须知假说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国外假说并不能在国内市场中简单套用。经典假说在我国市场中屡被证伪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和发行市场结构与欧美等发达股票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经典假说的制度基础并不具备:欧美发达股票市场中股票发行采用注册制,发行定价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博弈各方(包括创投)所发出的信号都能在新股发行定价中得以较充分体现;而我国股票一级市场发行制度(审核制)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制制度,新股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定价,创投作为资本市场上的新兴机构,在首发定价过程中的议价能力与券商相比微乎其微,其所发出的价值信号往往被承



销商忽视而难以在新股发行定价中得以体现。通过构建“相对发行市盈率”这一指标，将时间因素和行业因素予以剔除，借以衡量股票发行价格的相对水平，我们证实了“创投无法对首发上市企业的发行定价产生影响”这一假设。

这暗示我们，在鼓励发展创业风险投资行业的同时，也应推进股票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升我国股票发行市场的定价效率，为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提供更为有效的渠道。

我们进一步对造成我国资本市场中“创投持股会提升企业首发折价率”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机制机理进行了解释。创投的“市场力量功能”，使得其能够吸引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二级市场参与者，帮助发掘股票价值，从而改善原来较低的二级市场定价效率。因此，创投在不影响一级市场定价的情形下，通过提高二级市场定价效率提升了企业的首发折价率。以我国中小板市场上的公司及其创投股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假设。而为进一步验证“市场力量假说”，我们考察持股创投个数、创投持股比例、创投担任董事比例以及创投参股年数与企业 IPO 折价率的关系并发现：多家创投持股的企业上市时，市场力量功能较显著，说明创投联合投资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关注度；创投持股比例与 IPO 折价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创投持股比例越高越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加；创投参股时间越长，企业 IPO 折价率更高，说明创投的市场力量功能与创投对企业的了解程度显著正相关。

该结论的启示是：应合理引导我国股市目前已经出现的创投市场力量成为“理性的”市场力量。具体而言，在我国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股票市场建设中，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创投“市场力量功能”的发挥，改善二级市场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高股票交易的定价效率；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二级市场借助创投题材的短期炒作，有效防范过度投机和价格操纵行为。

#### 14. 明斯基的时刻真的来临了吗？

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

《“大衰退”以来明斯基思潮之动向——一个批判性评述》，《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如果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让经济学家凯恩斯名声大振的话，那么最近这场“大衰退”则使明斯基这位经济学家声望日隆。的确，在2008年这场被诸多财经媒体贴上“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标签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股强劲的明斯基思潮便以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来袭，在政界、商界、学界和媒体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既然，如他们所言，“明斯基时刻”降临了，那么明斯基的时刻真的就来临了吗？答案或许不容乐观！

首先，出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这一术语，虽然在“大衰退”之后作为标语而广泛传播，但事实上，该术语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证领域都是存在争议的。这种争议背后反映的是对明斯基基本意解读上的参差不齐，其后果是该标语不仅会造成明斯基思想理解上的困惑，还可能会贬低甚至歪曲明斯基的思想。一方面，明斯基毕生致力于研究金融周期的演变阶段

和动态机制，而所谓的“时刻”只是这种内生动态的“冰山一角”，更是背后的现实动态内生演进逻辑的必然结果，因而事实上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明斯基时刻”往往被解读为一种异常情况或意外事件，然而在明斯基看来，这种不稳定性的产生或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具有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特征，故而该时刻歪曲了作者的核心思想。

其次，这股思潮对明斯基主要贡献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FIH）的诠释也是存在误区的。一方面，有关该假说的大量建模工作均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将他们各自眼中明斯基 FIH 的基本要素抽象出来，从而不得不抛弃其他要素，这些被抛弃的要素有些是模型框架本身无法兼容的，有些则是模型根本无法表述的，但是却可能是明斯基理论当中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些建模工作可能会为了建模而使明斯基的理论“削足适履”，如此一来便歪曲了或者至少是没有如实地全面反映明斯基的思想。另一方面，对该假说依赖于经济主体非理性行为或心理机制的批评事实上误读了明斯基的本意。对于明斯基而言，导致体系内部脆弱性一再产生的机制并非依赖于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更非取决于心理机制。正是不确定性笼罩的金融化经济体系内部“理性”经济主体依据所谓的“干中学”和“启发法”的逐利行为，才引致金融体系的日益脆弱，而非理性因素作为不稳定性中的典型要素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对明斯基对实体经济缺乏考察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的。尽管明斯基所采用的“华尔街范式”的确将“金融关系和现金流网络”置于研究的中心，而对第二位的“生产和分配机制”考察较少，但这并非意味着明斯基忽视了实体经济领域。事实上，FIH 正是基于实体投资理论，考虑了企业投资生产所产生的债务融资成本和利润现金收入，而只是更多着眼于债务方面的变化。

最后，明斯基思潮虽然也“袭击”了明斯基其他的诸如“基金经理资本主义”（MMC）和“最后雇佣者计划”（ELR）的研究主题，但显而易见的是，对这些主题的关注和研究却甚为不足。然而，这两个理论却同样是明斯基的重要贡献，而且事实上，它们是明斯基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所持有的独特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该图景当中的其他要素（如 FIH）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忽视这两个理论要素不仅无法完整地理解明斯基的思想，而且还可能误读乃至歪曲明斯基的本意。

总之，虽然“大衰退”以来的这股明斯基思潮席卷了学术圈内外，但不幸的是，明斯基的时刻却没有真正到来，他的思想并没有真正为人们所理解。这一方面表现在，已有研究对明斯基的主要贡献（FIH）的理解依然存在纷争乃至误读；另一方面则在于，这些研究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明斯基的理论框架，以至于出现对明斯基思想的碎片化和庸俗化解读。因此，未来的研究亟需厘清明斯基 FIH 的精髓，同时构建一个包含明斯基完整图景要素的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明斯基的洞见。

##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创刊于 1980 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本刊坚持“让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砥砺思想”的基本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学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2012 和 2013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在最新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69 种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在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25 种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 版）》和《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3 版）》中，《经济评论》连续两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mailto:whujer@163.com)

---